

# 论明代卓异地方官的表彰

余劲东

(长江大学 历史系, 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 明政府每三年对全国范围内的地方行政长官进行考察。考察结束后,偶尔会对治绩和品行格外突出的地方官予以表彰。荣获表彰者主要是省级行政长官,但也会有较小比例的府州县亲民官;建功立业、政绩出色、品行出众都是获评卓异官的必要条件。获评卓异的官员,会受到赐宴、赐币和陞擢等形式的激励。表彰卓异官不仅给地方亲民官树立了榜样,同时也为中央部门选拔出一些具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官员,对国家政治生活尤其是对官员梯队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明代;朝覲考察;卓异;地方官;表彰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4-0076-07

明代效仿成周官员考核之制,每三年对全国地方官进行集中考察,称为“朝覲考察”“述职之典”。意即在各地任职的官员须入京覲见皇帝,向皇帝陈述在任期内的政绩,最终接受皇帝的处置。朝覲考察的首要目的在于裁汰不职官员,但正如明人所论:“有黜无陟、有怨无德,自非君父责成”<sup>①</sup>,如果在考察过程中多威而寡恩,则明显有违制度设计的张弛之道。有鉴于此,为激励天下官员,明政府规定“若廉能卓异、贪酷异常,则又有旌别之典,以示劝惩”。<sup>②</sup>可见尽管考察侧重对不职者的处罚,但若地方官果然功勋卓著,明廷也不会吝惜激励与肯定。对官员的激励措施当中,最可瞩目的便是在考察结束后,对少数政绩和品行格外突出者,亦即“卓异官”进行表彰。

尽管过往对明代朝覲考察的研究并不罕见<sup>③</sup>,但这些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对朝覲考察的制度条文予以释读,而对制度运行的诸多微观环节,例如表彰卓异官的问题,未曾给予专门关注。柏桦关注到对地方官员的奖励问题<sup>④</sup>,但其研究偏重于对优秀官员的普遍表彰,对卓异官这种“优秀中的优秀”,探讨仍有待深入。例如,整个明代究竟有多少地方官可以被称之为“卓异”?卓异官的选拔是否有明确的原则和标准?表彰卓异官除了树立楷模

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作用?本文希望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揭示出明代表彰卓异官的基本情况及其意义。

## 一、明代表彰卓异官的概况

明廷于正德、万历年间先后颁行两部《大明会典》,其中都对明代先前君王表彰卓异官的历史有过回顾<sup>⑤</sup>,但从这些回顾中却仅能知晓明廷表彰卓异官的基本历程,难以知晓与之相关的制度规定。或许正是因为官方行政法典中缺乏明确规定,导致明政府对卓异官的表彰具有很强的随机性。明中期翰林官王九思(1468—1551)忆及往昔表彰卓异官的盛况时称:

弘治壬戌(十五年,1502),吏部(马文升,1426—1510)言:“方岳郡县吏政有卓异,不可但已,宜稍稍旌之,以劝豪杰。”……皇帝览奏甚喜,命锡宴礼部。盖近代旷典,予所幸见者也。自予麾出外郡,窜伏林莽,历述职者,又三度矣。未闻有所旌拔如壬戌时。<sup>⑥</sup>

以此推算,在王九思所经历的四次朝覲考察中,明廷仅表彰过一次卓异官。王九思任职翰林,熟稔当朝掌故,所言应当不会是空穴来风。加之王九思的陈词并非孤证,仕宦时代与其相近的方良永

**[收稿日期]** 2019-02-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代文官考察决策与运行机制研究(18FZS004)”,湖北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项目“明代湖广进士群体研究(18Q04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余劲东(1987—),男,湖北武汉人,博士,长江大学历史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明史。

(1454—1528)称:“故事,司府官来朝,吏部择其治行卓异者,奏旌之。有大燕之锡、宝璫之颁,而超擢继之,类数十年一举,难之也。予滥与之后,已十年矣。”<sup>⑦</sup>查方良永获评卓异官的时间在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sup>⑧</sup>,正好在时间上印证了王九思“又三度未闻所旌拔”的说法,可见明廷表彰卓异官的举动实属罕见。然而,王九思、方良永二人所处的年代过分接近,弘治、正德年间极少表彰卓异官,很可能只是简单的因为皇帝怠政。仅举此一时期的例子,很容易让人怀疑此间状况不足以揭示明廷表彰卓异官的全貌,为此有必要对明朝表彰卓异官的历史脉络予以梳理。

明代最早带有表彰朝觐卓异官性质的事件发生在洪武十一年(1378),当时明廷令朝觐官“称职而无过者为上,赐坐而宴”<sup>⑨</sup>;但此时明朝朝觐考察制度尚未齐备,相应的褒奖人数和表彰方式同样无规矩可寻。明太祖第二次表彰卓异官已迟至十五年后,洪武二十六年(1393)对时任云南左布政使张统(?—1403)予以玺书褒扬。<sup>⑩</sup>此后,朱棣于永乐七年(1409)对山东汶上知县史诚进行表彰。<sup>⑪</sup>宣德八年(1433),明宣宗对何文渊等七人予以表彰,这是明代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表彰卓异官。在正统十年(1445)至万历二年(1574)的百余年间,共有九次表彰卓异官的记录,分别是天顺四年(1460)、弘治十五年(1502)、正德九年(1514)、嘉靖二年(1523)、嘉靖八年(1529)、隆庆二年(1568)、隆庆五年(1571)、万历二年(1574),<sup>⑫</sup>每次表彰的人数不等,但一般在

十人左右,以上是明代建国后两百年间表彰卓异官的基本情况。按明制:朝觐考察每三年举行一次,然而对卓异官的表彰却如此希阔;可见王九思、方良永所描述的状况并非弘治、正德年间所独有,即使将视线扩展到整个明代,表彰卓异官的举动都只不过是偶尔为之。既然获评卓异的概率如此之低,那么究竟满足哪些条件的官员才有机会获评卓异?

## 二、卓异官的选取标准

尽管从理论上讲,既然是表彰卓异官,那么所有治行突出的地方官都会被视为潜在表彰对象。然而在实操过程中,是否就以治绩突出作为唯一的表彰标准?此外,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被视为是“优秀中的优秀”?

吏部考功司是负责文官考察的首要衙门,在考功司内由主事到员外郎再到郎中逐步升迁的李开先(1502—1568)熟稔吏部典故,对表彰卓异官的基本情况知之颇详。其称:“天顺庚辰,政绩卓异者,钦赐衣楮及宴于礼部,方伯而下共十人,而守居其三;弘治壬戌,六人,而守居其二;正德甲戌,十六人,而守居其六;嘉靖癸未,并未入朝者移文奖劳十余人,而守居其四。”<sup>⑬</sup>可见在历次表彰卓异官时,知府一级官员所占的比例可观。既然像知府这样并非总是亲身理民的地方高级长官都能获评卓异,由此推算,州县父母官获评卓异的概率也很可能不低。

但实际情况却绝非如此:天顺庚辰(四年,1460)被表彰的十人中,布、按一级长官共计六人;<sup>⑭</sup>

① (明)汤北京:《灵麓阁集》卷2《参部臣阻挠察典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9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08页。

②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13《朝觐考察》,《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③ 在过往学者当中,高寿仙对明代官员的考核标准及内容给予过关注(《变与乱:明代社会与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8—173页);杨万贺探讨了明代朝觐考察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制度的评价(《明代朝觐考察制度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11年度硕士论文);柳海松关注了明代官员考察制度的建立和演变过程及官员考察制度的特点(《明代官吏考课制度的建立与演变》,《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论明代官吏考课制度的特点》,《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5期);刘志坚从法律史的角度对明代官员考察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考满与考察的区别以及明代统治者的官员管理思想进行了辨析,《关于明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几个问题》,《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刘志坚、刘杰:《试论明代官吏考察制度》,《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④ 柏桦:《父母官:明清州县官群像》,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203—220页。

⑤ (明)李东阳,等:《正德会典》卷1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3页。

⑥ (明)王九思:《渼陂集》卷9《送王令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8页。

⑦ (明)方良永:《方简肃文集》卷2《送郡守冯检斋公入觐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4页。

⑧ (明)杨廷和,等:《明武宗实录》第108卷,正德九年正月壬辰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6年版,第3559页。

⑨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13《朝觐考察》,《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

⑩ (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24《吏部尚书张公统传(郑晓撰文)》,《续修四库全书》第5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

⑪ (明)李默:《吏部职掌》不分卷《考功二·朝觐选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184页。

⑫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13《朝觐考察》,第221页。在此期间其他考察年份或许亦有零星表彰,但既未被《会典》记录,据笔者所见亦极为零星且大多缺乏旁证,因此阙而不录。

⑬ (明)李开先:《李中麓闲居堂文集》卷5《送兰川魏太守入觐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58页。

⑭ (明)李贤,等:《明英宗实录》卷311,天顺四年正月丙午条,第10819页。是年表彰的详情如下:“旌异朝觐官布政使贾铨、梁燾、萧暉、徐璟、季颢、按察使刘孜、知府丘陵、胡浚、知州张福、知县张瑄。各赐锦衣一袭钞一千贯,宴于礼部。”

弘治壬戌(十五年,1502)得到表彰的六人中,布、按长官亦有二人;<sup>①</sup>正德甲戌(九年,1514)受表彰的十六人中,实际仅有五名知府被表彰,而其他十一人皆为布、按系统的长官或佐贰官<sup>②</sup>;嘉靖癸未(二年,1523)获表彰的十六人中,同样仅有四名知府而其余皆为布、按系统正、佐官<sup>③</sup>。按明朝官制,省级布、按二司正官及佐贰官,每省不过数人<sup>④</sup>;而府、州、县正官的数量则十分可观。结合统计数据发现,不仅省级长官获评卓异的绝对数量远高于亲民官,而省级长官获评卓异的比例更是遥遥领先于亲民官。由此看来,获评卓异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或许并非政绩突出、政声远扬,而是官职大小和官位高低:地方官的职级越高,受到表彰的可能性越大;而真正处理基层事务的知州、知县等亲民官,被表彰的可能性则大大降低。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显而易见:一是某些需要调动全省之力的重大事件,如旱涝防治、军事行动的后勤保障等,省级长官显然能比府、州、县官发挥更为重要的统筹作用;二是在传统政治文化下,下级往往会将自己的成绩归功于上级领导有方,所以地方高层领导的成绩更易突出。

尽管高级地方官获评卓异的可能性较高,但仅仅身居高位仍不是保证获评卓异的唯一条件。毕竟明代地方行政机构多达两直十三省,即使是省级行政长官的总人数都不可小觑,然而获评卓异者却屈指可数。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可以促成地方官获评卓异?就制度设计层面而言,并未发现明代对卓异官有明确的评定标准。然而,从实际的政治运行轨迹中,仍能探寻出有关官员获评卓异的原因所在。据笔者所见,能够获评卓异的官员无一不在政绩抑或品行方面有远超同侪的表现,这尤为集中地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恰逢时机建立不世之功。如洪武二十六年唯一被表彰的张紱,明太祖朱元璋亲赐玺书称:

“曩者讨平西南夷,命官抚守,尔紱实先往任,今五年……今年来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绩。”<sup>⑤</sup>张紱受到嘉奖绝非无功受禄,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最终占领云南并设立治所,当时大多数官员视赴云南任职为畏途。而张紱被派去云南后,短短五年内就从参政升任布政使,且在洪武二十年的考评时获评“治行为天下第一”<sup>⑥</sup>;最终在镇守云南的第十一个年头,成为明代第一位确实可查的卓异官。与张紱功绩类似的,还有正統年间任职云南大理知府贾铨(永乐二年,1404进士)。明英宗在位前期,云南地区爆发了历时十年之久的麓川之役。贾铨在王骥(1378—1460)率军征讨麓川期间,一直稳定保障军需后勤,间接促成了这次军事行动的圆满完成<sup>⑦</sup>,可称厥功至伟。又如正統年间北直隶平乡知县丘陵(宣德四年,1429举人),其任职地“故无城郭,又漳水数为患,陵力为筑城。”<sup>⑧</sup>这一举动初看起来,不过是保障民生的寻常工作,然而在稍后的土木之变中,平乡因城池坚固而成为当时直隶地区“独免于难”的县城,这种独一无二的功绩自然引人注目。上述三人的际遇实属希阔奇逢,因此其政绩更易凸显,获评卓异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二是在传统治理领域成为表率。明代根据六项具体指标来衡量地方官员的功绩,诚如林希元(1481—1565)所言:“学校、田野、户口、赋役、讼狱、盗贼之六事者,乃国朝督察守令之令典。”<sup>⑨</sup>若能在处理这六项政务时有异常突出的表现,亦可为获评卓异增加筹码。永乐四年受到表彰的山东汶上知县史诚祖便是如此。“上(永乐帝)之巡狩北京也,遣御史考察郡县长吏贤否,升黜之。还,奏诚祖治行第一。”<sup>⑩</sup>众多御史巡行天下,而史诚祖能够在考察对象中脱颖而出,可见其确属当时郡县长官中的

① (明)刘健,等:《明孝宗实录》卷184,弘治十五年二月丁未条,第5127页。是年表彰的官员包括:“广东左布政使周孟中、浙江按察使朱钦、苏州府知府曹凤、大名府知府韩福、沂州知州张凤、宜阳县知县吴献人。”

② (明)杨廷和,等:《明武宗实录》卷108,正德九年正月壬辰条,第3559页。是年褒奖的情况如下:“吏部举江西左布政使陈恪,湖广左布政使黄瓚,山东右布政使方良永,江西右布政使张嶺,山西右布政使臧凤,云南按察使李充嗣,浙江副使徐蕃,福建副使汤沐、姚模,浙江左参议罗钦德,河南僉事刘玉,南昌知府李承勋,扬州知府孙禄,处州知府刘斐,金华知府刘□,台州知府李光翰,俱才行可称,宜如例旌奖。从之。”

③ (明)徐阶,等:《明世宗实录》卷23,嘉靖二年二月丁亥条,第826页。是年的表彰官员包括:“布政使王萼、孙禄、张璉,副使王廷相、袁檉(檉)、周广、魏校、徐文华、汪玉,参政顾璘、郑毅、林富。知府罗侨、欧阳铎、朱裳、翟鹏”共计十六人。

④ 按明制,每布政司有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左、右参政,左右参议,无定员;按察司则有按察使一人,副使,僉事无定员。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卷75《职官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38页、第1840页。

⑤ (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24《吏部尚书张公紱传(郑晓撰文)》,第226页。

⑥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51《张紱》,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175页。

⑦ (明)何乔远:《名山藏》卷13《典谟记》,景泰五年正月条,《续修四库全书》第4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24页。

⑧ (明)曹金:《(万历)开封府志》卷18《人物·丘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6册,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701页。

⑨ (明)林希元:《林次崖文集》卷9《赠郡侯西川方公朝觐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03页。

⑩ (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93,永乐七年六月壬寅条,第2364页。

矫矫者。弘治十五年受到表彰的南直苏州知府曹凤,其治所是“富饶甲天下”的苏州,政务堪称繁剧;然而他却让素号难治的苏州“政平讼理,而当时各郡,又莫不推先苏州”<sup>①</sup>,获评卓异可称实至名归。而同年受到表彰的大名知府韩福亦可称先进,在其履任之前,大名府的情况是“稍设民壮,以通判领之,然籍为空额而已,盗稍稍起”;其履任之后,“仿古为保甲法,每十家置一牌、百家置一长,以时询察之,盗贼灭迹。”<sup>②</sup>可谓用实际行动保障了京畿地区的安全,其举动同时兼具治安、军事和政治三重意义。因此,史诚祖、曹凤、韩福等人获评卓异可称实至名归。

三是品格足以成为道德模范。李濂(1488—1566)记载弘治十五年和正德九年表彰卓异的情况时称:“在弘治中,钧阳马端肃公(文升)为冢宰,尝旌拔大名守韩福之风概,宜阳令胡献之廉平。而正德中,遂庵杨先生(一清)为冢宰,亦尝旌拔南昌守李承勋之器识,扬州守孙禄之苦节。”<sup>③</sup>“风概”“廉平”“器识”“苦节”虽然不过寥寥数字,但却都是封建社会对臣子品格的关键期许。能够将这些品格做到天下闻名,自然也无愧于“卓异”之名。必须指出的是:因为难以对道德模范制定明确的评价标准,因此不仅需要其在品格上无可挑剔,更重要的是在高层有官员愿意对其欣赏并予以荐拔。引文中述及的四位卓异地方官之所以能够受到表彰,无一不是由当时的吏部尚书促成。

除了上述三点可以为地方官获评卓异增加筹码之外,一个特殊的情况是部分卓异官可能本身就是朝廷的重点培养对象。例如宣德八年(1433)被表彰的温州知府何文渊(1385—1457)等七人,早在宣德初年,“大臣奏苏州等九大郡号繁剧难治,遂擢况钟等九人为知府,授以玺书,假便宜从事。”<sup>④</sup>至宣德八年,宣宗格外“问吏部尚书郭璉曰:‘先所任九人为知府,亦有来者乎?’璉以何文渊等七名应,乃

召入便殿,命中使传语奖劳。”<sup>⑤</sup>这类官员明显属于从中央派遣至地方积累基层工作经验的重点培养对象,自然会得到皇帝和人事部门更多的关注,获评卓异的可能性也因此大幅提高,九人中七人被予以嘉奖即是明证。

综上可知,如果地方行政长官希望在朝觐考察后获评卓异,要么跻身地方官员中的较高位阶、要么在功业、治绩和品行上获得远超同侪的成就、要么在入仕伊始担任低级京官期间便努力获得皇帝或朝中主要官员的注意,如果能同时满足以上两种或三种条件,获评卓异的可能性便显著增加。当然,官员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历史的机遇同样是获评卓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贾铨之于麓川之役、丘陵之于土木之变的贡献,便属可遇而不可求。但即使上述所有条件都齐备,仍不必然保证获评卓异,上级领导、吏部举荐、皇帝认可三者缺一不可。正因为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因此在《万历会典》编成之前的明代近220年时间内,明代仅有不足百人获评卓异,而这也正显出卓异的难得。

### 三、获评卓异后的奖励措施

既然地方官在任上历尽艰辛也极难被评为卓异官,但在明人送别人觐官时却时常以获评卓异相期许<sup>⑥</sup>,这就不禁让人思考:被评为卓异官究竟有何实际利益可图,抑或仅是博取一个带有荣誉性的虚名?

从政治运行的实践过程来看,明代通常会对获评卓异的官员进行精神或物质奖励。方良永称:“有大燕之锡、宝饗之颁,而超擢继之”<sup>⑦</sup>,大体揭示出明廷表彰朝觐官之大端。虽然间或有单独赐宴或赐币的情况发生,但一般而言,赐宴和赐币并行不悖。如前引李开先所述:“天顺庚辰,政绩卓异者,钦赐衣褚及宴于礼部”<sup>⑧</sup>;与其记述相印证的是:“湖广左布政使(萧暉),天顺庚辰入觐,以其治行卓

① (明)韩邦奇:《苑洛集》卷4《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野曹公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5页。

② (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30《户部侍郎韩公福传》,《续修四库全书》第5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99页。

③ (明)李濂:《嵩渚文集》卷65《赠开封太守白侯入觐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61页。

④ (明)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18,《续修四库全书》第35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⑤ (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39《朝觐考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173页。

⑥ 如罗大紘在送别其乡徐县令的赠序中称:“方今圣天子弘在宥之政,旦暮忧民甚急。岁首受贺,霁颜而问卓异计相,举吉水治平天下第一,上赐诏旨褒慰,而侯以民之良俗之仁,归德于无为,而不自有也,斯亦盛朝休美矣。”明显寄托了对徐县令在稍后获评卓异的祈愿。见(明)罗大紘:《紫原文集》卷4《邑父母徐石楼入觐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92页。

⑦ (明)方良永:《方简肃文集》卷2《送郡守冯检斋公入觐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4页。

⑧ (明)李开先:《李中麓闲居堂文集》卷5《送兰川魏太守入觐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58页。

异,赐宴礼部,有袭衣、宝钺之颁辞。”<sup>①</sup>此外,正统十年(1445),“令朝觐官员廉能著称、治行超卓者,赏衣服一袭,钞百锭,仍赐宴于礼部”<sup>②</sup>,皆是赐宴及赐币并行。

如果获评卓异者需要留任处理地方政务,无法入京享受赐宴的礼遇,皇帝则会派专人将敕书、“宴”、币送至卓异官处。如永乐年间未能入觐的山东汶上知县史诚祖,成祖除了专门发布敕谕对其予以勉励之外<sup>③</sup>,还命“礼部差人将酒一尊,钞一千贯,织金纱衣一套赏之”<sup>④</sup>。倘若皇帝不赐酒、钞,至少也有御赐玺书以示褒奖。如“嘉靖癸未,(来朝者)并未来朝者,移文奖劳十余人”<sup>⑤</sup>,但这种仅赐予玺书的情况较为少见。除获得实物赏赐之外,某些获评卓异者尚可享受被引至御前朝参、近距离一窥天颜的殊荣。例如《万历会典》中所记录的卓异官会见仪节,实际反映的就是万历二年(1574)时皇帝亲自表彰卓异官时的真实情形。<sup>⑥</sup>

尽管表彰卓异官的方式看起来多种多样,但赐宴吏部不过是一晌之欢;因为明代宝钞价值低廉,赐币也更偏向于象征意义;面见皇帝的难得际遇固然可以成为官员记忆中的宝贵经历,但也难以在实质上激励到更多官员勉力奉公。因此,上述种种表彰手段的实际效用似不容乐观。

最能鞭策广大地方官僚群体的奖励措施,无疑是对卓异官的超擢。据笔者所见,绝大多数卓异官在受到表彰后的数月之内便会有极为明显升迁。正所谓“其有才行超著、政绩卓异者,铨部往往旌拔之,以励天下”<sup>⑦</sup>。例如天顺间被表彰的萧暉,“归数日,召还拜礼部尚书”<sup>⑧</sup>;弘治年间被表彰的韩福,短短三年内,完成了从沂州知州、云南某府知府、广西布政使右参政等多个重要岗位的历练,并在其后上调中央;正德年间被表彰的汤沐,仅一个月就完成了从浙江副使到江西按察使的迁转<sup>⑨</sup>,类似案例层

出不穷,在此不一一列举。如果把对卓异官的关注由数月延展至数年,可以看到获评卓异者的政治前途尤其光明。洪武年间被表彰的张统官至吏部尚书;而在宣德八年被表彰的何文渊、隆庆五年被表彰的萧大亨等多人,也同样最终升至吏部尚书、兵部尚书这样的高位。

然而,如果将视线扩展到整个明代的官员表彰乃至中国古代历朝的官员表彰,可以发现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并行,几乎是所有君王激励臣下的共用手段。就明代而言,即使是在三年考满之外的优秀官员,也会受到类似的嘉奖。如果对卓异官的表彰方式与寻常官员无甚差别,如何能突出他们的“卓异”?尤可关注的是:卓异官的身份与其它优秀地方官不同。因为考满本就是评定等次为主,少有裁汰;而朝觐考察的首要意图就在于查处不职者。然而卓异官们在以裁汰不职为宗旨的活动中,不仅未被处分,反倒受到嘉奖,足以证明他们都属于“优秀中的优秀”,对于他们如果也只采取寻常的表彰方式,岂非让更多的官员止步于优秀,而无心追求卓异?

#### 四、表彰卓异官的意义探微

对于这一问题,明人早已有过反思。有官员认为“考察之条,止以简不肖为主”<sup>⑩</sup>,如果在考察后对卓异官进行表彰,不仅有失“汰官邪,警有位”的制度设计初意;而且由于缺乏明确的表彰制度规定,这种表彰的给予太显随意,获得表彰的官员也难以获得远超同侪的礼遇,因此不必在考察后评选卓异。陆可教(1547—1598)则提出更为实际的问题:“往者……一切所取(卓异官),多英敏颖脱之士,巧睨捷应,靡所不当于上指,而民或不见德。于是后之当事者矫之,持取世之所谓‘悁介’‘苦节’者为标目,以示风尚,厥意诚善,然以之奖激廉吏可耳,要

① (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3《南京礼部尚书萧暉传》,第717页。

②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13《朝觐考察》,第221页。

③ 《明实录》详细记载了相关表彰敕书的内容,姑备列于下。“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朕统御天下,夙夜求贤,共图治理。往往下询民间,皆言苦吏苛急,能副朕心者,寡焉尔。敦厚老成,恪共乃职,持身励志,一于廉公,平赋均徭,政清讼简,民心悦戴,境内称安,方古良吏,亦复何让?特升尔济宁州知州,仍掌汶上县事。其益共乃职,慎终如始,以永嘉誉。钦哉。”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93,永乐七年六月壬寅条,第2364页。

④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4《考课下·选举考》,《续修四库全书》第76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81页。

⑤ (明)李开先:《李中麓闲居堂文集》卷5《送兰川魏太守入觐序》,第558页。

⑥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44《诸司朝觐仪》,《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⑦ (明)李濂:《嵩渚文集》卷65《赠开封太守白侯入觐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61页。

⑧ (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3《南京礼部尚书萧暉传》,《续修四库全书》第5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17页。

⑨ 汤沐受到表彰的时间为正德九年正月,而在次月便已获得升迁。相关记载,见《明武宗实录》卷108,正德九年正月壬辰条,第3559页;卷109,正德九年二月戊戌条,第3565页。

⑩ (明)李默:《吏部职掌》不分卷《考功二·朝觐旌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184页。

于化民成俗,未有云也。”<sup>①</sup>埋头做事的地方官容易淹没在繁琐的政务中,而善于逢迎的官员却能够脱颖而出,所以表彰“巧睨捷应”之士,实则无益于治理;转向表彰爱民官员时,又容易矫枉过正,注重选拔道德楷模,而不是有经世之策的能吏,这对移风易俗也没有太多好处。在这些现实困境下,表彰卓异官虽然看起来立意良善,但其意义实在不可高估。

初看之下,反对方的观点确实有其合理之处,也揭示出表彰卓异官的问题所在。对于反对者所提出的问题,明代高层难道并不知晓?实则早已有人提出与之针锋相对的意见。弘治十二年(1499)科道官奏请表彰卓异官称:“此实风厉臣工之大要,前代赐金果,皆尽其人乎?亦举一劝百之典耳。”<sup>②</sup>可见在当时人眼中,表彰卓异官的重要性体现在“举一劝百”,通过小规模树立典型来起到大范围的激励作用。弘治十五年(1502),吏部尚书马文升奏请表彰卓异官,其说辞也与科道官们类似,其称:“政有卓异,不可但己,宜稍稍旌之,以劝豪杰。”<sup>③</sup>尽管表彰卓异官的仪式十多年甚至更久才举行一次,但树立的少数楷模却可能让更多地方官见贤思齐,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力和凝聚力,因此表彰卓异官无疑极有必要。

但吏部所期待的“举一劝百”,究竟是否能发挥预期作用?很难说明代后期的某位卓异官受到嘉奖,是因为受到之前榜样的鼓舞。毕竟从未有任何卓异官在文字中流露,自己是以张紘、何文渊等人为榜样来不懈努力,最终获评卓异。那么,“举一”究竟如何“举”,所期待的“劝百”又何以“劝”?

为探明以上问题,笔者选取天顺四年、弘治十五年、正德九年和嘉靖二年的四次表彰进行抽样分析。选取这四届表彰为样本,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这四届表彰具有连续性,可以较好的反映明代,至少是明代中期的数十年间被表彰官员的发展路径;其二,这四届被表彰的卓异官人数适度,既不至于因样本数量过小而影响准确性,也不至于因样本数量过大而在数据处理时出现明显偏差,得出的结果理应更为准确。

据笔者列表分析,在天顺四年至嘉靖二年的 63

年间,明廷共表彰了 47 位卓异官。<sup>④</sup>如果跟踪追寻他们的成长轨迹,可以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特点。在这 47 人中,最终官至七卿者 10 人,占受表彰卓异官总人数的 21.3%;除七卿外的三品京官 21 人,占总人数的 44.7%;而调入京城任职四品以上京卿的官员共计 33 人,占表彰总人数的 70.2%。需要格外说明的是:以上 33 人所任全为京城部门实职,而非仅挂京官衔,或是仅享受京官待遇。此外,在这 33 人中,至少有 17 人担任过巡抚都御史,以其京官身份对地方政务进行更为宏观的调度。

即使是剩下的 14 位未能成为京官的卓异官,除重名者过多导致无法确定履历的数人外,尚有 5 人从知府任上快速成长为地方省级行政长官(包括丘陵从南直淮安知府升任山西左布政使、罗钦德从浙江左参议升任贵州按察使、孙禄和袁宾分别从扬州知府和按察司副使升任应天府尹、刘斐从处州知府升任布政使右参议)。而被淘汰的官员,大多是因年老无法继续任职抑或自己放弃仕进机会,如天顺四年被表彰的梁燾,在天顺五年八月便已去世;<sup>⑤</sup>同年受表彰的徐璟,同样在天顺五年四月自乞年老致仕。<sup>⑥</sup>

尽管表彰卓异官的初衷,或许并不在于选拔地方有前途的官员进入中央任职,但通过以上数据的计量分析,不难看出无论表彰卓异官的初衷为何,实际上却已经为中央输送了一些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官员。一部分卓异官进入负责政务决策的六部衙门,使中央的决策更“接地气”;一部分卓异官担任巡抚都御史,便于有效统摄地方政务。这些卓异官很可能在日后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这或许才是明代士人以获评卓异来互相期许的关键所在。而对更多尚未获评卓异卓异的地方官而言,不定期的评选卓异官向他们释放出这样一种信号:如果能够获评卓异,就能让自身获得快速迁转,从而到更高的平台上为国效力,这便足以激励相当一部分有政治追求的地方官,通过勉力履职来追求自身政治抱负的实现。这或许才是吏部坚信表彰卓异官可以“举一劝百”的原因所在,也是表彰卓异官的积极意义所在。

① (明)陆可教:《陆学士遗稿》卷 10《送邑侯斗仑汪先生入计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60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0 页。

② (明)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 2,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50 页。

③ (明)王九思:《渼陂集》卷 9《送王令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48 册,济南:齐鲁书社 1997 年版,第 78 页。

④ 这四次考察过后共表彰来朝官 48 人次,但其中孙禄被表彰两次,因此总数应为 47 人。

⑤ (明)李贤,等:《明英宗实录》卷 331,天顺五年八月丁丑条,第 11345 页。

⑥ (明)李贤,等:《明英宗实录》卷 327,天顺五年四月乙丑条,第 11244 页。

## 五、余 论

本文从明代朝觐考察后对卓异官的表彰出发,指出以裁汰不职为宗旨的考察,却能使少数官员受到表彰,足见明代的卓异官实际上是“优秀中的优秀”。尽管担任省级高官可以为获评卓异增加筹码,但卓异官的评价标准还包括建立卓越的功勋、在传统治理领域成为表率,或是在道德方面成为楷模。明廷对卓异地方官的激励措施包括赐宴、赐币、玺书奖谕以及职级的提升。表彰卓异官的意义不仅在于给地方亲民官树立榜样,也为中央部门选拔了一些具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官员;尤其是对卓异官的快速迁转,向地方官员群体释放出勉力履职即可得到国家奖掖的积极信号,驱使他们更好地为治理地方服务,成为维护明代基层稳定的坚实

力量。

必须承认的是,本文仅止于探寻明代表彰卓异官的标准、奖励措施和意义问题。表彰卓异官在明朝究竟是否已经形成制度,如果已经形成制度,其确立的标志究竟为何?卓异官的人选究竟如何经过层层酝酿最终获得中央批复,究竟是上层的赏识重要,抑或是下层的举荐重要?相较于过往历朝而言,明代对卓异官的表彰有无明显的演进与变化,是否凸显出明显的时代特色?现今对“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表彰,是否可以从明代卓异官的表彰中寻得端倪或是借鉴?对于这些问题,无法在本篇中予以论述,实际上仍有探寻的空间。

(责任编辑:闫卫平)

## A Research on the Rewarding of Outstanding Officials in Ming Dynasty

YU Jin-d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Yangtze University, Jing Zhou, Hubei province, 434023)

**Abstract:** The Ming Dynasty imitated the officials' assessment institution of Zhou Dynasty, assessing all local officials every three years, which called Pilgrimage Investigation. After the assessment about local officials, the emperors of Ming Dynasty would accidently reward some officials who had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he officials who received rewards were mainly leaders of provinces and only few of them were country magistrates or mayors. These outstanding officials would enjoy dinner and bonus granted by the emperor, then had a promotion very soon. The action of rewarding outstanding officials not only established model for lots of local officials but also had positive influence on politic operation especially on building echelon of officials.

**Key words:** Ming Dynasty; Pilgrimage Investigation; Outstanding Officials; Reward